

# 我的下乡经历 和教育人生

国赫孚

我生于1950年，我们这一代人，经历了“文革”、上山下乡、上学返城，等等。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缺少学校的系统知识的学习，但是我们的经历和现在的学生相比也有优势，这就是丰富的人生阅历。我曾经在汽车修理厂、皮鞋厂、机械厂、电机厂劳动；下矿井挖过煤；在部队学军当了一个月的兵；以后当过教师、校长、教育局长，接触了百态的人生和社会。尤其是下乡插队5年，饱受了生活的磨难。这些经历砥砺了我的意志、拓宽了我的眼界、开阔了我的胸襟、增长了我的智慧，对我所从事的教育工作，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影响。

## 苦难的经历成了得心应手的教育资本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正是中国农村最贫困的年代。在内蒙古5年农村生活的苦难经历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感受。

刚下乡两个月我们就赶上了秋收，对割豆子的印象最为深刻。割豆子不如割谷子累，但豆荚刺扎手，防不胜防。一开始我们知青都戴手套，但没两天

手套就扎烂了。社员干活时在接触豆荚刺的一刹那，手往下一顺，抓住了豆子但避开了刺，而我们不得此要领，抓一把，就被刺实实在在地扎一把。两个月的秋收下来，左手被扎得一个个针眼，成为一个个黑点，密密麻麻布满了手指和手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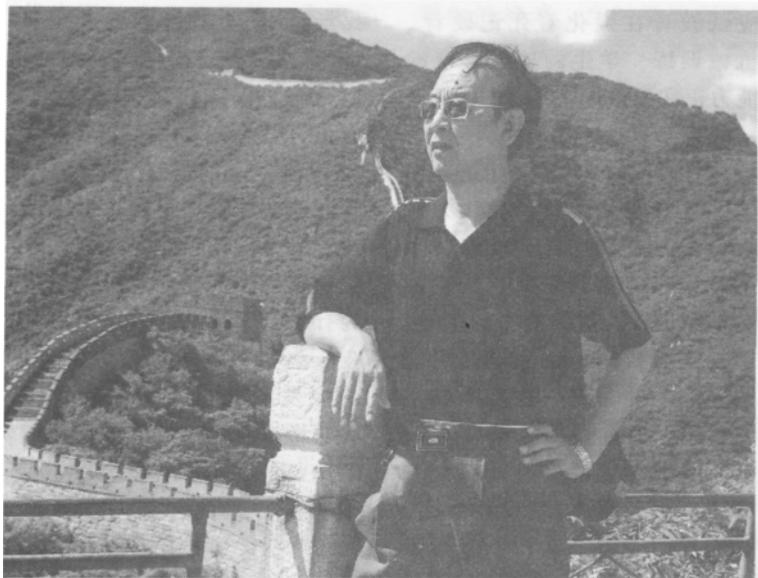
夏天铲地，早晨3点半下地，10点半收工，下午1点出工，晚8点才收工。内蒙古地广人稀，一条垄有3里地长。铲上五六十步，汗珠子就吧嗒吧嗒往下掉。无论多累，你不能停下来直直腰，因为打头的在前面，一步跟不上，就要落后，就意味着你不是一个男子汉，而是一个孬种。队长在后面检查质量。只要你锄头入地浅一点，草没有被连根锄掉，马上会听到一连串的脏话。我们从小虽没有受到过铲地的训练，但我们都是要脸面、要尊严的人，不会在劳动中投机取巧，每棵苗，都是按照质量要求认真地铲过，一条垄的几千棵苗都一一认真地对待，而认真就意味着多吃苦。

从日出到日落，从春种到秋收，认真是我们始终保持的劳动态度。这种态度，渐渐地

融化在血液中成为了我们的习惯。社会上都说下过乡的人劳动态度好，这样的态度，就是在3里长的垄上训练出来的。从事了教育工作，无论是做班主任，校长还是局长，天天接触的大量的是一些琐碎的、繁杂的事务，这些事基本上都不是属于那些扭转乾坤、人命关天的大事，但我都是尽力而为之地做好每一件事，就像当初认真地铲好每一棵苗。如果说我在工作中做出了一些成绩，主要的还是与认真的态度有关。

下乡的第一年，我们干社员一半的活，叫“半拉子”，相当于少年劳动力。第二年，我们就成为了一个整劳动力，第三年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劳动要领，适应了紧张的劳动节奏，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壮劳力。这是一个磨炼的过程，从中体会到，面对艰难你不能唉声叹气，要挺起腰杆、咬紧牙关。坚持，就是胜利，这些耳熟能详的话语，是我们通过秋收获得的另一种收获。

那时，不光干活累，吃的比起城里也有很大的落差。当地老百姓一年要有半年多靠大酱和咸菜度日。我们集体户生



活更是一团糟,既不下酱,又不腌咸菜,整个春天,常常是在高粱米饭中撒点盐下饭。至于肉这种“高档的奢侈品”,5年中一共吃了有数的几次,不仅记忆犹新,而且对当时的细节历历在目。

一次面对豆猪肉(人若吃了没有经过高温的豆猪肉,容易得猪囊虫病,能致人以死命),本来我斩钉截铁地下了决心不吃,但拿起筷子决心完全抛到了九霄云外。不大会儿工夫,一大碗肉就见了碗底。我们几个知青都是热爱生命、有着清醒的头脑,竟无人提出异议。三十多年后,当时吃过豆猪肉的几个同学又聚在了一起,大家庆幸没有因此致病。

就是靠咬牙和坚持,当年无论是繁重的体力劳动,还是恶劣的生活条件,我们都能从容应对。现在看起来,这些苦难的经历成为了我们的精神财富。因为有了这5年知青生活的底,此后的苦和难都不在话下。

什么是幸福?幸福就是感

到今天比昨天好,明天比今天好,有了下乡的经历,我们终生会有幸福相伴。

1995年,我在天津耀华中 学做德育副校长。此后每年我都要带学生下乡参加学农劳动。农村的条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但生活条件怎么也不如城市,不仅学生感到不适应,一些年轻的教师也感到不适应,而我却觉得和当年下乡比起来,这点苦不值一提。1996年9月我带学生去天津静海县学农基地劳动,学生接触农业劳动,尝试集体生活,热情高涨,大都能自觉按学校的要求去做,但有一些情况事先没有预料到。如基地的水咸,学生喝不惯,有的去小卖部买矿泉水,有的干脆不喝水。再如基地的厕所是旱厕,粪便就堆积在粪坑中,学生看了恶心,有的就憋着不解大便。后来在家长会上我了解到,这样的情况还很多,反映出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适应问题,引起了我的思考。素质教育要关注学生的成长,实践活动中学生暴露出

的问题,给我们带来许多教育的契机,应该善于捕捉。第二年学农,一到基地,我就专门给学生讲了喝水和用厕的问题。我没有简单地批评学生“娇娇二气”,而是从三个方面讲了道理。一是这里的水咸、厕所条件差,这都是事实,但目前广大农村大部分还都是这种情况,这就是中国的国情。改变落后的面貌有待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奋斗。二是在艰苦的条件面前,我们也要善于适应环境,这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能力。三是从生理和病理两个方面讲不喝水、不解大便会危害身体健康。这样的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,这一次,不喝水、不解大便的问题没有再发生。老师们说,你把一个不宜于在大会场合讲的问题,讲得既有知识性,又有思想性。我想,我能够关注到这个问题,能够讲明白这个问题,首先是因为我对艰苦环境的适应能力。为什么对实践活动情有独钟,可能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,我的下乡经历都变成了得心应手的教育资本。我曾无数次带学生学军、学农,每一次,学生们的体会中总是有一条,“愉快地经受了艰难困苦的考验”,当然这充分地体现了活动的教育价值,但我那点教育的资本,也发挥了应有的引导作用。

### 逆境的磨砺使我有 了爱心和责任

下乡的5年我们能够坚持下来,能够勇敢地面对苦难,原因很多,首先是村里的农民生活都很苦,不仅仅是知青,其实那个时代整个社会都在承受苦难;其次是有信念支撑,

我们集体户的很多人都是自愿去的，怀着到农村去接受革命洗礼和自我改造的强烈愿望，尤其是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人，认为只有苦才能改造自己的灵魂；还有一个原因是在“极左”年代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“狗崽子”处处受到歧视，但在农村反倒感觉宽松些，集体户中的不少人出身都不同程度地有点问题，而老百姓对我们都是以大城市来的知青高看一眼，他们更为看重的是人老实不老实，干活出不出力，耍不耍滑头，至于家庭出身这样严肃的政治问题，在他们看来远远比不上能够填饱肚子更重要。

初中毕业我便下了乡，深知自己知识的贫乏，我想应该学点高中知识，就从集体户的同学那借来了一些高中教材，每天在油灯下看书做题。不管白天劳动多累，即使在铲地时一天只有六七个小时的睡眠，我也要挤出一个小时看书。

自学遇到的困难主要有两个，一是教材不全，数学是从第三册学起；二是身边没有老师答疑，能够请教的几个高中同学相继选调走了。我记得当时看到“负120度角”时，如堕五里雾中，怎么会出来负的角度呢？看不懂只能硬着头皮往下看。春节回家时，找到初中教师请教，只寥寥数语，即解开了疙瘩。

我特别羡慕现在的学生们拥有的优越的学习条件，有系统的教材，有各种辅导资料，有老师的点拨和答疑。但是，现在的学习又出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，外部的条件都完备了，但唯独缺失了学习者自己。课堂上满堂灌的现象习以为常，

应试教育在强化着死记硬背、机械训练，学生的独立思维的能力正在消退。

近年来，我在学校不遗余力地推动自主学习。首先提倡学生自己阅读教材。我认为对终身学习来说，自己能够看懂书是最有价值的。从我的自学经历看，这种能力的培养，不仅是必要的，也完全是可能的。但这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，师生的观念都需要改变。有的学生说：“别让我们看书了，多麻烦！高考考什么，就给我们讲点什么，不就行了吗？”有的老师说：“我给他讲他都不懂，自己还能看明白？”但是，我始终坚持着推动自主学习，而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，应该说，这与我那一段艰苦的自学经历不无关系。

1972年集体户有两名知青被选送上大学，对我是一个强烈的激励，从此，我的学习更加刻苦。为了使学习的环境更好，我干脆搬到了马圈去住。春天开化以后，马圈里弥漫着刺鼻的尿臊味道，但这里非常安静，只有马嚼草料的声音，没人串门聊天。

是年7月，我们到公社去参加考试，两年多的功夫没有白下，我对上大学充满着乐观的估计，似乎胜券在握，做梦都在盼着拿到大学的录取通知。但那年发生的张铁生白卷事件，使得考试成绩对录取不产生任何影响。录取的原则只剩下了“出身与表现”。大队长来小队检查工作，带来的坏消息给了我沉重的打击，由于出身不好，我上学的事泡汤了！

几年来我被大队、小队所重视，被提拔成小队会计，使

我渐渐地忘了自己身上还有“出身不好”这根尾巴。我对知识充满了渴望，对上学充满了憧憬，甚至对选调到工厂都不屑一顾，一门心思就想上学。下乡的5年里，我拼命地干活，在农民中得到男女老少的好评，我想不通，父亲的“历史问题”为什么要让我承受惩罚？那一夜，老队长没走，他默默地听着我发泄着牢骚。最后我问，我这样出身的人还有没有希望？老队长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千万不要灰心丧气，我们了解你，相信你，往远处看，你有希望！”他的话虽然给我带来了温暖，但毕竟抵挡不住现实的冷酷，我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沮丧之中。

别扭了几天之后，毕竟小队还有许多事情要做，生产队还要种地，老百姓还要吃饭，我又投入了紧张忙碌的工作。过了几天，出人意料地又传来了好消息，我被录取到东北师大数学系，由悲转喜的激动让我不能自己。原来旗招生办的通知发到公社之后，公社文教助理曲冠军立即向上反映，国赫孚在公社的6个名额中排在第三号，此人表现优秀，希望旗招办重新考虑。旗招办研究了公社的意见后仍然“维持原判”，理由是“他的家庭有重大历史问题”。曲冠军当即予以反驳：“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，对‘可教育好的子女’要给出路。谁表现好，谁表现差我们基层最有发言权。如果你们不尊重基层的意见，那你们愿意选谁就选谁，我们公社一个意见也不签署。”曲冠军的强硬态度促使旗招办重新研究并改判了“同意”。其实，在那个年代，出身是决定一切的，旗招办的做法

代表了社会上通行的、无可非议的思维方式。而在“极左”年代能够遇到敢于坚持原则的曲冠军，才纯属偶然。

经历了这次上学的曲折，我对出身有了清醒的认识。到了大学，我努力读书、工作，但在政治上不再敢存奢望。系里曾经积极地动员我，要发展我入党，但外调之后也打消了念头。党总支的一个干部还好心心地告诉我的女朋友，“你要认真地考虑一下，国赫孚的出身要影响他一辈子，要影响到将来你们的家庭和孩子”。如果不是“文革”结束，不是邓小平，她说的，会成为事实。

“文革”前后十几年的时间，正是我从少年、青年走向成年的时期。出身像阴影一样伴随着我的成长，让我自惭形秽，摧残着我的心灵，打击着我的自信。

如今时代变了，作为教育者，我们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，永远要给学生提供健康成长的身心环境，但当前，这是一个远远没有实现的理想，新的时代同样存在着伤害学生心灵的内容和形式。

2000年，我受命组建天津中学。时值中师布局调整，外语师范学校整体并入天津中学。当时学校已经招了两届学生，入学成绩几近全市招生收底线。2001年，第一届学生即将升入高三，学生两极分化严重。教师纷纷要求分快慢班，否则课堂教学难以组织，好学生尤其要受到影响。对此，我陷入了两难。一方面，常识告诉我，分出慢班容易出现乱班，会给学校管理造成麻烦；另一方面，我也知道，分出快班有利于好

学生的培养。当时学校面临着师资严重缺乏，有过执教高三经历的教师更是寥寥无几。而第一届学生的高考成绩又会对新学校的声誉造成影响。如果考得一塌糊涂，不仅学生和家长不满意，学校很有可能陷入生源差——高考成绩差——生源更差——成绩更差的恶性循环中，这将意味着新学校的将来就是一所豪华的薄弱校。

思考再三，我想与其全军覆没，不如先保住一部分学生。于是，我同意了分快慢班。

然而，两个月下来，当时的担心成为了现实，不仅慢班课堂纪律难以维持，而且为应付无休止的破坏行为，学校陷入了防不胜防的焦头烂额之中。正当这时，一位慢班的学生推开了我办公室的门，他说，他十分想学习，但学不了，上课一团糟，眼看着高考一天天临近，焦急万分。他质问我：“学校是否想把我们放弃？”我面对的是一位渴望知识、不满现状的诚实的学生。这是一张带着稚气的脸，他的眼神中透露着焦急、企盼、无奈、气愤的目光。他渴望知识，盼望着能考上大学，也心甘情愿为此付出努力。诚然，他的成绩并不好，被分在了慢班，但这能够成为剥夺其学习权利的理由吗？我的孩子考上了国内知名的重点大学，现仍在读博，可以肯定将来能有一个成功和幸福的人生。而我面前的学生今后的前途会怎样呢？

我过去长期在重点中学任教，教的都是“好”学生，我从来都问心无愧地说，我对得起学生！但是今天，面对着一个慢班学生的质问，我哑口无

言了。我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，但我不能编织一个漂亮的谎话去欺骗一个单纯的学生。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但今天当着一个慢班的学生面，我默默地落泪了。泪水中有无奈，也有良心的愧疚。因为，我不再能说出，我对得起学生。这个学生当年没能考上大学，不知道他现在何方。如今，学校度过了初创的艰难时期，师资强了，生源质量不断上升。但6年前，一个慢班学生的质问仍萦绕在我耳畔，他那焦急、企盼、无奈、气愤的目光，像一幅特写永远烙印在我的脑海。

我以自己的经历告诉老师，教育者，一定要善待学生，伤害学生的心灵就是犯罪！假设“文革”没有结束，假如没有遇到曲冠军，今天，我可能就是一个驼着背、满脸皱纹的老农民。如今，时代的变革早已医治了我曾经受过伤害的心灵。我入了党，当上了校长、局长，头上闪耀着一圈圈的光环，可以有尊严地生存了。我们也应该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有尊严地生存，有信念地生活，为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尽一份应尽的责任。

作者简介：国赫孚 1950年出生于天津。现任天津市天津中学校长，特级教师。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数学系。2001年入选教育部中学骨干校长高级研究班学习。2002年当选为天津市人大代表，任天津师大兼职教授，曾获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、天津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。

(责任编辑 刘然)